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资金扶持项目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 第六卷

李 怡 主编

古今流变与 中国新诗白话传统的生成

谢君兰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资金扶持项目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 第六卷

李 怡 主编

古今流变与 中国新诗白话传统的生成

谢君兰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自选项目成果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q201618）成果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 第6卷, 古今流变与中国新诗白话传统的生成 / 李怡主编; 谢君兰著.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543-0256-9

I. ①现… II. ①李…②谢…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②新诗—诗歌史—中国 IV. ①I209.6
②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6859号

古今流变与中国新诗白话传统的生成

Gujin Liubian yu Zhongguo Xinshi Baihua Chuantong de Shengcheng

策划编辑 张灵舒 张 瑛

责任编辑 黄初镇 张灵舒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杨亚丽

责任校对 胡艺超 张 瑛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13B 邮编: 510665)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版人 吴 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邮政编码: 528225)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2 字数220千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3-0256-9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总序：回到“大文学”本身 |

李 怡

“回到文学本身”，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倡议。20世纪80年代，有感于中国文学受制于社会政治这些“文学之外”的现实，我们提出“回到文学本身”，注重“文学之内”的研究，强调“审美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代中国人觉悟到谈论文学不再等同于政治表态，也有别于道德教育，对“文学作品”思想与文字的鉴赏从此成为一件意趣盎然的事情，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复苏的基础，也是如《名作欣赏》这样的“欣赏类”、“阅读类”杂志闪亮登场的历史背景。阅读、欣赏，一个似乎意味着文学普及的名字，在80年代的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大众普及”，而成为广大文学研究学者自我训练的起点，在当时，数量众多的活跃一时的文学研究者都与《名作欣赏》等结缘，或者贡献自己的新锐见地，或者长篇连载，甚至在此发表处女之作。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形势”陡变。一方面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都逾越了“文学”的边界，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思想史的领域里一展身手，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日益跨出了“文学”的范畴，成为其他学科特别是现代政治学、思想史、社会学的一种材料。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文化研究”的范式更在中国流行开来。“文化研究”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其先驱人物是威廉姆斯（R. Williams）与霍加特（R. Hoggart）。霍加特在1964年创办的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第一个正式成立的“文化研究”机构，从80年代开始，“文化研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及美国等地迅速发展，至今，它几乎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进一步打破了文学与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的间隔，将文学作为社会文化关系版图中的有机元素，其重点不在品味文学的审美个性，而是掂量和解剖其中的“文化意义”，特别是热衷挖掘社会结构中种种的阶级、权力、性别与民族的关系。可以看到

的现实是，“文化研究热”已经以汹涌澎湃之势在中国高校与学术机构中蔓延开来，每年我们都可以读到这样的学位论文：在文学的学科标志下尽力展开的却是关于社会文化与历史问题的广泛讨论，文学现象不过只是其中的部分材料而已。

西方的解构主义也以“文学性扩张”的判断给予这样的思路莫大的鼓励。乔纳森·卡勒告诉我们：“如今理论研究的一系列不同门类，如人类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历史等，皆可以在非文学现象中发现某种文学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雅克·拉康的研究显示了诸如在精神活动中意义逻辑的结构作用，而意义逻辑通常最直接地表现在诗的领域。雅克·德里达展示了隐喻在哲学语言中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描述了古代神话和图腾活动中从具体到整体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类似文学题材中的对立游戏（雄与雌，地与天，栗色与金色，太阳与月亮等）。似乎任何文学手段、任何文学结构，都可以出现在其他语言之中。”^①

文学内容的日渐稀少的确令我们对“文学”的曾经的痴迷遭逢尴尬，越来越多的“文学之外”的知识领域的入侵让我们对自己的学科归属不无焦虑，甚至“绝望”：

没有人对诸如文学叙述、描写和修辞，以及审美经验这类东西感兴趣。失去了这些探讨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什么理由再撑着文学这张招牌呢？

传统的文学学科，更不用说现当代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回文学的困境不是来自外部其他强势学科的挤压，而是自己要改弦更张。就像一位黄花闺女，不是受到外部强迫，而是自己打定主意跃跃欲试要出台——这有什么办法？

写下这些文字，并不是要对别人说三道四，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在内的文学同仁们的警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在潮流之外，没有人能够被幸免，也没有人能够被赦免。正像当年杀死上帝一样，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杀死文学的刽

^① 乔纳森·卡勒：《文学性》，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0—41页。

子手，如现在不放下屠刀的话。^①

就是我自己，也因为文学史叙述一再为抽象的理论所占据而充满困惑：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我曾经试图提出：“我们当今的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知识结构’，严重忽略了对文学作品（也就是文学“原典”）的把握和理解。新的文学史写作必须认真解决如何让文学史的教学与学习回到文学作品这一根本，如何通过文学史的讲述呈现文学自身的魅力，如何让文学史的学习成为进入现当代精神殿堂的趣味无穷的过程等问题。”^②

当然，所谓学科的“规范”其实并不可能获得完全的共识，我们也无法断定跨越性的研究在未来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新的学科，形成新的学术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我们跨出了文学，试图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领域里寻求伸展的时候，也同时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我们怎样将“文学”作为材料，最终都必须在其他学科中取得真正的发现，换句话说，以“文学”为跳板，我们最后要达到的“高度”必须符合其他学科的水准。比如我们可以借用左翼文学的社会批判主题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状况，但那时的中国是不是就如我们这些文学材料中所描述的那样呢，“文学”自己就不足够了，能够检验我们结论的一定是历史学的相关“规范”，我们也可以通过延安文学的发展探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但是进入社会史、经济史与政治史的领域，可供我们比照分析的主要不是文学的想象，而是一系列丰富的数据与案例，在这个时候，我们既有的知识显然已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近几年来，在突破文学边界，进入“文学之外”的道路上大步前行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尴尬，例如新左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是希望将延安—“十七年”—“文革”的文学历程肯定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文化硕果，殊不知，不仅其他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人难以认同，就是近现代史学界与中共党史的学者也颇不以为然。

跳出“文学”的框架，在更大的范围内表述问题，看起来是超逸了文学，其实骨子里却依然动用着文学的想象，所以就无法真正回答“文学之外”的问题。这样的尴尬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① 陈晓明：《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关于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思考》，《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② 李怡：《文学史是什么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那么，回到文学自身，是不是就真的可行？真的理所当然，真的理直气壮呢？

如前所述，虽然我们目睹了这一口号在20世纪80年代的激动人心的“拨乱反正”之功，也见识了跳出“文学”之后的种种尴尬和困惑，但是，平心而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如何更文学”其实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在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诉求既美丽，更正义，因为我们曾经的文化专制让一切关于文学的讨论都无可选择地纳入了政治表态的范畴，在这时，重申“文学”的价值，其理由不仅在于文学，更在于恢复人基本的言论权利与自由思维的权利。正是在这样一种“正义”的向度上，我坚持高度肯定这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并且主张继续研究和光大这一伦理正义的可能，对于90年代就此的诸多批评都不予认同。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在当时，对于伦理正义的强烈渴求的确远远超过了对于口号内涵与学理的细致分析，比如什么是“文学”？什么又是真正的“文学本身”？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当时，在未经严格的学术追问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将这一“文学本身”视作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赋予它某种本质性的猜想，比如思想的现代性，语言的白话，等等。

正是这样未经追问的模糊给了90年代的质疑以机会。当然，这不是说在今天，所有自“文学”逃逸的学人都出自同样的思想基础，但至少其中相当多的人是逐渐感受到了“文学”的不稳定、不可靠，从而企图在“文学之外”的领域捕捉某种真切的事实。比如，我们曾经说，追求“现代”的思想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涵，但问题在于，深入的考察却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思想却千差万别，胡适有胡适的现代观，陈独秀有陈独秀的现代观，一向质疑的鲁迅更与他们迥然有异，更不要说左翼、右翼与延安道路了；白话呢？虽然可以解释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但是后来的考证也逐渐证明，新文学并不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现实，何况新文学作家本人也有放下白话，重操文言的选择。如此一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究竟是指什么呢？我理解，就是类似的困惑吸引我们的研究者开始迈出（或者说“解构”）了“文学”的大门，企图在一个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层面上寻觅现代中国人的切实追求，而“文学”逐渐降低为社会文化整体面貌的组成元素之一。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说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是指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就

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在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自身的本体性要求未能得到充分的张扬，文学的审美特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政治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就20世纪文学而言，如果不顾历史的氛围，忽略文学生长的特殊政治背景，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合理的评价。^①

在今天，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多历史事实的逐步澄清，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现代中国作家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等待他们关怀和解决的“问题”绝不只是作为“艺术”的文学，在更多的时候，文学的问题、艺术的问题是不得不纳入更大的也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的整体问题框架中来加以思考的，而且问题本身的错综复杂与历史的流变繁复也使得这些问题一点也不单纯，介入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需要不断地调整，在这个时候，抽象、笼统地谈论“回到文学本身”显然也是空虚的，无的放矢的。

既不便抽象地诉求“回到文学本身”，又不能因为超逸“文学”而陷落到四不像的尴尬，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努力的方向呢？在我看来，一个可供思考的方向就是：继续回到文学，但不是那种理想化的“纯文学”，而是包含了诸多社会文化信息的“大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未来，也许就在“回到大文学本身”。

回到大文学本身，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把对“文学”的关注融入对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既然文学本来就不能独善其身，那么就不妨最充分地尊重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将文学的阐释之旅融通于寻找历史真相之旅，这里有现代中国政治理想的真相，经济生态的真相，也有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深刻烙印，与历史对话，将赋予文学以深度，与政治对话，将赋予文学以热度，与经济对话，将赋予文学以坚韧的现实生存品格。

回到大文学本身，最终体现“本身”的还是“作品”，也就是说，所有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对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离弃文学作品，直接讨论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与经济；恰恰相反，进入“文学之外”，是为了最终返回“文学之内”，这里的“内”不是抽象的本质化的事物，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学作品

^①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本身，就是说，对所有历史文化的考察、分析并不是要确立我们新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而是深化和完善文学作品的“阐释学”。

回到大文学本身，我们的理性认知与感性想象、知识社会学的考辨与感悟体验式的批评也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术发展，曾经以对理性规范的强化来排除文学的感性想象，以知识论的建构质疑体验论的缺陷，其实，即便是在“文学之外”的最抽象的理性思辨之中，我们也难以摆脱骨子里的文学想象，反倒是不能自我承认的这种“想象”干扰了本该“不必想象”的社会科学的认知。与其让想象与感性如此扭曲地存在，不如为他们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结构”。如果我们力主回到以作品阐释为旨归的“大文学”，那么保留和发挥我们的感性想象也就是“文学”的题中之意；与此同时，跨出“文学”的“小”，纳入“文学之外”的“大”，也让其他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有了一席之地，让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社会科学认知模式有机会进入文学研究，弥补我们既往学术的种种不足。

| 目 录 |

总序：回到“大文学”本身 / 李怡

引 论 / 001

第一编 中国新诗的多重白话资源

第一章 白话诗：一种被追认与重塑的诗歌概念 / 011

第二章 历史语境中的多重白话资源 / 018

第二编 词汇与中国白话新诗

第三章 晚清白话诗里的语词 / 028

第四章 五四新诗的语词 / 053

第三编 音韵与中国白话新诗

第五章 “韵”与“音”：晚清诗歌的两条线 / 079

第六章 先验式的倡导：白话新诗里的音韵 / 101

第四编 句法与中国白话新诗

第七章 晚清“诗”与“歌”中的句法与意象 / 125

第八章 “最好秩序”的寻找：五四新诗中的句法 / 148

结 论 / 171

参考文献 / 174

| 引 论 |

一、探讨新诗白话传统的意义

中国诗歌历经千年演化，源远流长，迤逦多姿。从上古以劳动口号为主、音重于义的原始歌谣开始，到春秋的《诗经》、战国的楚辞体、汉朝的乐府、唐宋各有风韵的律诗绝句，明清各派对唐宋之风竭尽所能的延续或突破，乃至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现代新诗的出现……诗歌的发展脉络虽一路蜿蜒，有快有慢，但延绵不绝，从未停滞。如果有任何一个历史节点上的创作者想要回望过去，梳理诗歌的“来时路”，他们都能合理地使用“流变”这一概念，但要是站在中国诗歌完整的流变链条来看，能够被公认为“古今流变”或新旧分野的时段，能够让中国诗歌冠以“现代新诗”名号的，还是“五四”前后，或再模糊与灵活一些，将时间往两端延伸，扩展为清末民初时期。清末民初，同中国漫长历史中的任何一次风云际会相似，都面临时代文化信息的纷至沓来。这些信息冲击着人们的既有观念，带来思想的激荡与碰撞，也让诗歌样态发生改变。但这一次改变与以往任何一次变化又都有所不同，因为宏大的文化背景不仅包括过往与当下的汇流，还因为国门洞开涵盖了自身与外域的交融。相应地，诗歌也从精神旨趣、审美风格、形式内容等各个角度发生了更为彻底的改变，其中最直观与突出的“异象”莫过于语言基底从文言到白话的置换。从胡适倡导“白话入诗”开始，钱玄同、俞平伯等一批知识分子就聚焦于此，进行了实践与理论层面的持续争辩和摸索，这也成为新诗在诞生之初饱受争议与病诟的主要问题。其实“白话”作为长期贴靠草根阶层的语言种类，从唐宋开始就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自成一套“传统性”，“白话”在文学场内的出入也是古已有之，并不新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白话”开始不全然等同于彼“白话”——清末民初时期文学革新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对文言文的抛弃和在旧官话的基础上熔铸而成的“新式白话”。新式白话作为现代人思维方式的载体，因为在错综复杂的文化环境中左右奔突，融汇了可供汲取的多重语言资

源，吸收了民间口语、西方译词等各类语言因素，改变了汉语的句构形式与词语搭配方式，所以呈现出与传统白话不一样的质地。而语言的急剧变化反过来又影响着诗歌形态的生长。从文学的整体状况来看，诗歌作为与语言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文体，作为文学最难突破的“壁垒”，呈现出的发展面貌也显得最为艰难和特殊。

首先，这种面貌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新诗从酝酿到萌芽经过了时间的冲刷与塑形；其次，这种面貌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以白话作为基底，在化欧、化古、化土的基础上，吸收古今中外各种语言因素而成。也就是说，现代新诗接纳了外国诗歌的部分形态，受到古典诗词传统的潜移默化，并尝试了方言土语的融合。这三大方面组成因素的汇聚，造就了现代新诗不一样的语言质素。以此来看中国新诗的生成，多重白话资源就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除了白话本身之外，还有文言系统等其他语言资源也参与进来共同建构。因此，对于本书来讲，所谓的“中国新诗白话传统”的来源，就不仅仅意味着“白话”本身分作的好几类来源，还指向在“新传统”形成过程当中起到建构作用的多种语言资源。

以此更为宽泛的语言视角来看待这段新诗历史，就能获得与传统角度不一样的认识：以前我们总是将古典文言诗歌当作参照物来观照或比对新诗。的确，中国新诗诞生的时代背景就是人的现代性历史境遇与传统文言言说方式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所以从这一角度切入研究，容易发现新诗之所以为“新”的许多特质，比如在欧化影响下音韵的放宽或诗体的解放。我们很容易认识到，新诗显示出的基本特征是“以白话为基础、以相对自由的诗形为体式”等等；但当我们拿着这些标准，回到现代新诗作为语言基底的“白话”来探讨，同时还站在新诗所汲取的“多种语言资源”的发展历程来看时，我们会发现，这些界定原则还是显得粗糙，有的地方甚至还产生了矛盾——它们并不能将现代新诗同晚清甚至是古代的白话诗区别开来；而且如果站在作为白话资源之一的民间歌谣立场上，将现代新诗与时调小曲做比对，我们还会发现，前者的语言结构在整体上不是比后者更俗白松散，反而是更为精练雅致。于是原本似乎勾勒清晰的白话新诗面目，竟又变得模糊起来。我们不禁要问：现代新诗是传统白话诗的简单复制吗？诗体的“解放”又真的是其在当时的本质特征么？如果不是，它的“新”在更为宽泛的语言体系中又表现在哪里呢？

当我们意识到，作为语言依托的“白话”，一方面具有悠长深厚的民族传统性，有一直能够被称为“白话”的相对稳定特色；另一方面它也在一些历

史时期中吸收了新的资源，有不断涌动的自我流变性，在此“白话”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白话新诗”也就有了自己的发展源流——它并不是五四时期由胡适凭空创造，也不是一个业已存在的既定整体。另外，“白话新诗”的生成资源又不仅仅是“白话”，还囊括进了其他语言因素，所以它成立的标准也就不是“从传统文言诗歌中解放出来”那么单一。

当我们将新诗放置到当时的多重语言资源中去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中国新诗的生成其实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考量与解决。比如当时可被诗歌吸收的白话资源究竟有哪些方面？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没有遭到全然背弃，那么哪些因素通过何种形式得以保留？方言俗语是否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是怎样发挥的？作为外来因素的西方诗歌，在汉译过程中带来了什么新鲜的语言因素，又是怎样逐渐融入白话诗当中去的？属于印欧语系的英文由于语言构造的不同，对属于汉藏语系的中文的影响毕竟有限，那么影响究竟发挥到了哪一个层面？在这个语言背景下，五四时期的白话诗，相对晚清时期的各类诗歌形态，在诸如词汇、音韵、句法等不同层面的语言要素中，分别呈现出怎样新异的面貌？关键的一点：这一流变的过程如何展开？如果我们将这段时间白话诗语言体式演变的层次仔细梳理出来，勾勒出其肌理生长的细微性，那么在解答这些疑问的同时，会看到新诗如何在语言层面生成与以往有所区别的“白话传统”，也将呈现出中国新诗“蜕变”与“生成”历程中可能被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

对研究现状的分析，笔者主要从研究范式的简单说明与研究范畴的分类两个方面来进行。其中研究范畴主要涉及作为大背景的“语言与文学”关系的讨论以及作为论文主体的“白话新诗”的探究：

（一）研究范式

本文的研究范式，主要受到康林系列论文的启发与影响：他在《〈尝试集〉的艺术价值》、《中国古典抒情诗的本文结构方式》等文章中，将诗歌的“本文结构”分为包含语音组合和文法关系的语言体式以及语象世界、语义体系三大部分，分析出中国古典抒情诗的体征特质，并在此基础上以异常细致入微的手法剖析了《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第一部”，是怎样从以上三大特征中转化建构出“新”意的。文章清晰地呈现出中国诗歌“从古典向现代形态过渡”的过程。但遗憾的是，康林侧重的只是个案研究，并没能用更多实例来展

示新诗的变化，且参照对象是“古典抒情诗”。笔者在此研究范式的启发下，从诗歌本体论的角度出发，以文本的细读、归纳与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深入到白话诗内部，并从词汇、音韵、句法三个层面来梳理其从晚清到“五四”的变化历程，解析出白话“新诗”的指向与意义。

在内部研究上，本书则采用共时性与历时性并进的方式：一方面，挖掘出在同一时期内，白话新诗得以择取与融合的各种诗学资源，包括经常被忽视与遮蔽的民间俗曲歌谣；另一方面，以诗歌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也就是说本书还从语言与体式的角度探索新诗的变迁，并在历时性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对比分析的手法来考察这些变迁的层次。这是对象内部意义的探索，重点是白话新诗“怎样生成”。

（二）研究范畴

1. “语言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对于晚清到五四白话诗的解析，一开始就该建立在一个更为宏大开阔的讨论范畴里，这就是“语言与文学的关系”。“白话与诗”的种种融合与矛盾，都不过是这一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侧面或分支。只有认识到我们何以要在语言与文学的层面上来进行讨论，我们才能对“白话与诗”的清理有更为明确的探讨意识。

总的说来，在专著方面，高玉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是首部以现代汉语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为研究主题的著作。该书主要站在“器”与“道”的层面，强调语言不仅是工具符号，同时也是思想本体，因此语言的革新意味着人深层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呈现出来的研究方式是宏观性的理论思辨，拓展了笔者对于语言与文学研究的视野，但它的功绩主要在于一种深刻文学语言观点的提出，却少有具体的文本分析作为例证支撑。刘琴的《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联性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将关注点放置到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言文互动”的动态对话上，力图在现代文学发展的不同坐标上对这种互动所形成的口语化、欧化与诗化这三种基本话语类型进行论述。张卫中《母语的魔障——从中西语言的差异看中西文学的差异》则主要针对其中的“欧化”现象，从汉语自身的特性入手，通过中西语言的差异甄别来研究20世纪的汉语言文学，涉及汉语的能指优势、中西语言的句法特征等方面，对笔者研究译诗对白话诗的影响有一定启发。张艳华《五四文学的语言选择与文体流变》（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论及语言现代转型的前期准备、语言嬗变与新文学发生的关系，也讨论到作为文体变革实践之一的中国现代新诗。在单篇论文上，自90

年代初张颐武在长文《20世纪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中较早地论及新文学的语言问题之后,相关的论文可谓层出不穷,对笔者有所启发的也不少,如刘纳《新文学何以为“新”——兼谈新文学的开端》,该文主要以沈尹默的诗作《月夜》与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为分析对象,来阐释新式白话在诉诸阅读的特性上是怎样对新文学产生影响的。在对《月夜》分析中,研究者略涉及白话新诗在“音节”上的改变,但也只是论述了这一孤例,且没有从语言的各个方面铺展开来。总的说来,这些研究成果都不是专门针对诗歌而谈,中间有涉及,也只将其当作文学分类的一种掺杂在论述当中,因此它们更多为笔者提供的是一种语言与文学研究的视野与背景。

2. “白话新诗”的研究

五四白话新诗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理论的倡导、争论与研究。胡适、钱玄同、康白情、俞平伯、宗白华、郭沫若、闻一多等新诗草创期不同流派的诗人都先后发表过极具探索精神的诗论文章。有宏观分析新诗在相应时间段所取得的成就或缺陷的,比如胡适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就主要是对诗体解放后新诗取得成绩的解析,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则主要从具体诗人或诗派的角度点评新诗的不同特质,此外还有蒲风的《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茅盾的《论初期白话诗》等文章都属于这一类。专著则有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分别从新诗坛的“萌芽期”、“草创时期”、“进步时代”、“将来的趋势”四个阶段总结了新诗在当时的发展历程。也有主要针对新诗面临的困境、存在的问题进行学理讨论并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文章,比如康白情的《新诗的我见》,俞平伯《白话诗的三大条件》,《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宗白华的《新诗略谈》,等等。还有从诗体角度分门别类进行探讨的,比如仲密的《论小诗》,茅盾的《叙事诗的前途》,艾青的《诗的散文美》,等等。也有单独探讨某个诗集或作品的诗评,比如钱玄同的《〈尝试集〉序》,朱自清的《〈冬夜〉序》,俞平伯的《〈草儿〉序》,周作人的《〈扬鞭集〉序》以及闻一多著名的《〈女神〉之地方色彩》、《〈女神〉之时代精神》,等等。除了单篇评论之外,还有一些诗论专著融合了以上各类,如冯瘦菊的《新诗和新诗人》,共分三卷,上卷阐释诗的价值与功能等理论性问题,中卷介绍新诗产生的原因与历史,下卷则侧重论述诗人的作用,再如冯文炳的《谈新诗》,就具体谈及对《尝试集》、《扬鞭集》等诗集的认识,同时也兼有《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等评论性文章。此外,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朱光

潜的《诗论》等专著都以丰富的材料讨论了新诗内部的诸种问题。

以上内容因为是新诗生成期的即时言论，成为帮助笔者了解当时诗歌概况的详细史料。但对本论来说，最具相关性的还是其中一些具体涉及严格意义上“语言学”层面的讨论文章：其中完全针对“词汇”和“句法”的相对较少，比如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零星谈到使用错综手法“造句安章”，要学习西洋诗法“层层叠叠话中有话”，但并未专门提到“句法”；闻一多《诗的格律》在讨论音节的美丑时倒是提及“整齐句法”的作用，但这里的“句法”并不是严格语言学意义上的“句法”，只关乎诗行的字数。其中涉及最多的还是对新诗“音韵”的探讨：比如俞平伯《诗底新律》从五大方面提出制作诗律的要求，并修正了之前在《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中的诗律观；郭沫若的《论节奏》在韵脚等“外在律”之外，从“情绪的自然消涨”层面来讨论新诗“内在律”的建构；饶孟侃《论新诗的音节》旨在唤醒诗人对音节的自觉试验，并从平仄、音尺、韵脚等方面进行精细的探讨；卞之琳的《哼唱型节奏（吟调）和说话型节奏（诵调）》、《谈诗歌的格律问题》，朱自清的《诗韵》等文都是此类。作为专著，朱光潜的《诗论》更是从“诗与乐——节奏”、“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论声、论顿、论韵）”、“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赋对于诗的影响”等层面详细探讨了诗韵的建构。此外，还有一些不是专门讨论新诗语言的文章也部分触及了这一层面：比如俞平伯认为“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之一，就是“句中用韵、音节协和”；胡适的《谈新诗》也专列一节从诗句的顿挫段落与声调用韵等方面来谈“自然的音节”的成立……总之，大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对新诗的语言问题做出了理解和回应。但限于当时新诗极力挣脱文言传统，并力图获取自己合法性的具体历史情境，当时的研究者更多思考的还是现代白话新诗在文学革命中的意义、对于古典诗词的解放以及面临的各种责难与困境等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也尚未来得及清理新诗在白话诗立场上的内部变革。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五四白话新诗的研究有了推进，语言的话题作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更为醒目地走入人们的视野：

早在90年代初，朱晓进《从语言的角度谈新诗的评价问题》就在新诗的艺术成就之外，提出从语言与形式的角度重新反思其发展的问题与意义，并对五四初期白话文革命对新诗形式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当老诗人郑敏自1993年发表了《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等系列论文以追溯现代汉语与文学变迁历程的得失，并批判了五四文学革